

“三角和平论”与国际关系的“三维世界” ——评《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存与国际组织》

王义桅

【内容提要】 “三角和平论”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言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及国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其论证过程与理念具有明显庸俗国际关系理论痕迹，然其价值不在于结论，而是其论证过程，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综合性趋势，带动了方法论的辩论，是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困境的很好个案。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呼唤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述“三角和平论”的目的正在于揭示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及其阶级实质。

【关键词】 三角和平论 国际关系的“三维世界” 庸俗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 王义桅，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国际关系博士，历史系博士后项目参加者，邮政编码：200433。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对未来世界的看法首要的讨论仍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前景而展开。为此，国际关系学者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历史终结论”首先奏响了乐观主义的强劲音符，这是自由主义的第一声呐喊；接着，“单极时刻”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单极稳定论”则超越了“霸权稳定论”框框及传统现实主义的悲观腔调，展示出现实主义难得的自信。

表一、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学者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不同言论：

言论	提出年份	提出者/倡导者	要点	历史观
长和平论	1986	加迪斯	冷战是 20 世纪最长的和平时期	历史主义
历史终结论	1989	福山	冷战的结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	自由主义
大战过时论	1989	穆勒	战争成本的提高和战争意识的淡薄，使大国战争过时	乐观主义
单极时刻/单极稳定论	1990 / 1999	克劳特哈默/沃尔弗斯	冷战结束使国际社会进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它是和平的、持久的和稳定的	现实主义
文明冲突论	1992	亨廷顿	未来世界的冲突模式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	悲观主义
三角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 经济相互依存和平论 国际制度/组织和平论	2001 1993 1986 1995	拉塞特 拉塞特 罗斯克兰斯 基欧汉	民主、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组织共同塑造国家间和平	自由主义

种种言论及其根本分歧总体上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间论战在新时代的继续和不同反映。十分有趣的是,现实主义阵营在不断地分化(分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等流派),而自由主义阵营则在综合——“三角和平论”即是这种综合趋势的集中反映。“三角和平论”以民主和平论为其先导,在冷战的结束最终埋葬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对峙和人们认识到文明、文化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之后,重新唤起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分野。

拉塞特(也有的译为“拉西特”)就是这种国际关系泛意识形态化的先导之一。

一、拉塞特及其民主和平论

拉塞特:其人其书

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是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 Dean Acheson 教授,耶鲁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冲突解决杂志》主编,与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合著的《世界政治:选择的菜单》目前已出 6 版,影响甚广。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时选修了其所教的博士生课程“战争与和平理论”,对其国际关系定量化分析思路有所认识,拉氏基本上属于“形而下”型学者,具有典型的美国式轻历史、哲学,重方法,且定量分析有余而定性不足的国际关系研究风格。其与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所著《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存与国际组织》一书是其学术主张的集中写照。

民主和平论及其批评者

民主和平论并非新鲜事物,它拾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牙慧,并结合全球化的事实,认定“民主国家间不倾向以武力解决国家间冲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民主国家战争权掌握在民选政府手中,战争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民主国家间的认同感很强,相互容易理解,不倾向于使用武力而是使用外交、政治等手段解决彼此间分歧。言下之意是打仗是由非民主国家引起的;促进世界和平的办法是将非民主国家改造为民主国家。

这种民主优越感实际上是西方优越感的体现,同时也是强化西方认同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探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经典命题的努力。因为所说的民主标准是西方定的,迎合了西方民众的心理意识与社会偏好。在这种西方优越感的先导理念作用下,一批国际关系学者以各种方法(主要是以历史个案统计的方法)来论证其合理性。故而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国际关系言论或论调。

拉塞特并非民主和平论的始作俑者,但他却把民主和平论的定量化论述推向了一个高峰。乔安妮·高娃(Joanne Gowa)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反驳之,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发展。

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阵营内部与阵营外部,并集中在民主与和

See Bruce Russett, *Grasping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ee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4.

平的对应关系上。前者侧重于和平，认为国家制度——民主，并不能保证和平，充其量只能减少冲突，或认为战争与国家制度无关。而后者侧重于民主，对民主的定义、标准和实现民主的过程、民主模式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做了批评和思考，认为全球政治体制一元化或民主全球化的结局是无视或在摧残世界多元化；更有甚者认为民主和平论是本末倒置，民主国家间不打仗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把彼此间的仗打完了，而并非由于它们是民主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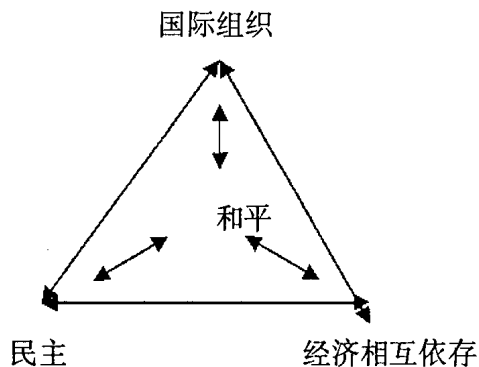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和平论者深感仅强调民主制度仍不足以反映全球化与世界多元化的事实，故而综合自由主义的其他言论，综合性地提出了“三角和平论”。

二、“三角和平论”的内涵与战略思考

人类对三角的钟爱源远流长，从日常生活器具“三角架”、人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到国际关系中的美中苏“大三角”……。“三角”是人们最常用的多边形，大概是由于三角是最简单而且是最稳定的多边形。拉赛特选择“三角和平论”应该也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一定程度上，“三角和平论”是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存和平论、国际制度（组织）和平论以“三角”矢量方式的叠加。

三角和平示意图



“三角和平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各自都减少了国家间冲突，结合在一起便能实现国家间的和平。“三角”的涵义是，每一角与另两角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稳定的平衡体（最小多边形），这是实现和平的最简便渠道；其潜在的思路是，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变量太多，无法穷尽，故和平并无充分条件，只能有必要条件，“三角”即为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三角相互配合、共塑和平，从而也就否定了寻觅到和平“全集”的可能性。这是对以往苦苦寻觅根治战争药方旧式思维的超越。

由此，“三角和平论”在许多观点上超越了民主和平论及文明冲突论，如《三角和平》第三章

Ibid, p. 271.

Ibid, pp. 82 - 85.

对民主化进程容易导致冲突的反驳,第七章否定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导致世界冲突的危险等。

但是,从战略上讲,民主和平论仍难以逃脱乐观主义的肤浅,扩张康德体系的努力显然也不成功,不过许多政策主张仍值得我们关注,如主张北约“东扩”,避免中俄结盟,拉俄罗斯加入“北约”,使中国无法选择,只好“跟着强者走”(bandwagon);民主、国际组织、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导致联合国安理会作用的增强,甚至预言“基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西方、俄国、中国的合作将会标志国际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从逻辑上讲,姑且不论其统计方法及定量分析科学性,“三角和平论”问题颇多,集中在“三角”与“和平”层次及三角间总体关系等方面。如,民主、组织与相互依存并非统一标准的向量,能够组成三角吗?就算能,矢量叠加,不相互抵消吗?

再者,三角是一封闭体系,战争与和平等因素是否都包含在三角之内?什么样的三角?等边三角?民主、经济、组织份量及其相互影响如何?实现和平的途径是“三管齐下”还是有一定的次序和着力点?这些都难以在书中寻找到满意的答案。

至于另一层次的“和平”问题,争议就更大了。和平并不等于“非战争”,仅以“三角”怎么各自减少冲突来论述是不够的。三角和平对两国战争的偏好,不能说明“三角”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作为。“三角和平论”陶醉于全球化时代的乐观景象,在反全球化运动日益强大、单极霸权日盛、非对称性战争的挑战凸现而组织衰微的时代,它显然缺乏历史的深度。

但是,“三角和平论”超越了均势和平论对大国政治的钟爱,超越了霸权稳定论的强权逻辑,并未忽视第三世界,而且给予相当重视,认为“中、俄都加入康德体系有助于第三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难能可贵的。

三、“三角和平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维世界”

如何评价“三角和平论”?学者间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具体化、综合化的理论反映,受到欧盟成功一体化经验的鼓励。否定的态度则说,它是康德哲学的粗俗化,首先是误解了康德式“和平”的哲学涵义,混淆共和与民主。其次举例反驳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民主、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组织“三条腿”都不缺,为何至今仍冲突不断?尤其是,以历史变量反驳“文明冲突论”,是误读亨廷顿的未来式,缺乏历史的焦虑,充分暴露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浅薄。

“三角和平论”对康德哲学的扭曲并非特殊个案,它是自然科学手段阐释哲学思想的局限与危险性的表现,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社会科学地位困境的反映。康德式“三角和平”说的是:“和平会在国家间出现,一旦它们具有三类共同性质:代议制民主、遵循国际法与国

Ibid, p. 297.

Ibid.

Ibid, p. 273.

Ibid, pp. 26 - 23.

Ibid, p. 108.

Ibid, pp. 26 - 33.

Ibid, pp. 253 - 258.

际组织，以及发达的商业一体化”，这是康德整体哲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表现。

“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演绎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定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因此，“合目的性”（国际组织）、“合规律性”（一体化）与“普遍理性”（民主）的“三位一体”，才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支柱。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显然缺乏广阔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在下述三个纬度展开。

表二 国际关系理论（IRT）研究的“三维世界”：

IRT的三维世界	关系中轴	演绎律	历史观	理念	研究视角	代表人物
纬度一	历史中轴	时间	合规律性	实然	历史	修昔底德
纬度二	现实中轴	空间	合目的性	当然	政治、经济、法	格劳修斯
纬度三	未来中轴	自身	普遍理性	自然	哲学、道德	康德

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就必须在上述“三维世界”的框架下探讨。大凡人类思想史中的伟大哲学家、历史学家，无不对世界的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只是哲学家的和平涵义与政治家的不同。

历史上，人们对战争态度有三个层次的演变：（1）道德层面，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主张通过道德来束缚战争。典型的说法是希腊格言：“战争之危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对应的认识是历史的合目的性，强调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2）政治层面，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民主和平论基本承接这一思维，对应的认识是历史的合规律性，强调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公民状态；（3）哲学层面，寄希望于理性，共同体等，强调战争源自人类社会的非理性状态。

和平问题亦可类推。康德的永久和平的宗旨是实现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并在联盟中寻求到两者的一致。而三角和平实现的是政治与经济（法）相结合，载体是国际组织。事实上，真正的和平理论应实现政治与道德和法律的结合，政治与历史、经济的结合。这就是“三角和平论”欠缺的根本。因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矛盾的累积，可以是一国国内，也可以是国际间，比如“9·11”事件是国际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下来的以极端形式的爆发；惟此，方能把握战争的历史与阶级根源。

John Ikenberry, “Political and Legal: Book Review on Triangulating Pea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1, p. 131.

康德 著，何兆武 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译序。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 124 页。

Russett and Oneal, *ibid.*, p. 102.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 139、143 页。

四、“三角和平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困境

“三角和平论”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缺陷，然而其价值不在于结论，而是其论证过程，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综合性（定性、定量分析结合）趋势，带动了方法论的辩论。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思考：

一、本书前言部分开篇即将国际关系研究类比为全球定位系统（GPS）式分析，反映了国际关系对可操作性的渴望，即现实需求催生理论，理论解释现实。

二、“三角和平论”只是一个案，它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状况：缺乏历史学家的深厚、哲学家的深沉、有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主观化和想当然。相比其他学科而言，“三角和平论”以“三角”的方式打造国际关系架构是幼稚的，这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种学科的悲哀和在社会科学地位困境的反映。

三、国际关系理论有无国界或特色可言？是否足够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稍微认真一点的思考即可发现，和大多数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三角和平论”也是一种美国式理论，因为“三角”皆有利于美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国际组织以及民主，无不深深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甚至有人说民主化即美国化。这恐怕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焦虑所在吧。

四、国际关系理论都假定国家行为的理性，忽视非理性因素，理性选择理论更是如此。正如经济学对人类理性行为的假设是其最基本的假定从而带来局限性一样，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也正源于其理性世界观：人的理性意识主导人的行为；由人性善恶推至国家性善恶。

五、善恶论只是国际关系的“二分法”思维的表现之一。善恶“二分法”（民主是好的，战争是恶的）、由文化与结构解释的民主与和平的二分法，主导了“三角和平论”的思维模式，其世界观即是“观念创造理论”——民主等“三角”都是好的，和平也是好的；只有好的才能派生出好的（和平），反之，恶的必然导致恶（战争）。这再次表明，“三角和平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阶级理论、虚伪的理论。

这种虚伪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根本对立，是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对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三大局限：

一、单线进化论，或西方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近代欧洲历史为背景，是西方意识形态决定论；

二、全球化优越论，或美国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相当程度是美国霸权压力下的产物，反映了强国意志，远未表达人类的普遍理性要求；

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主权陷阱”：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国家（尤其是大国）间关系、对称性作用力，对非对称性问题、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力忽视或重视不够，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Ibid, p. 53.